

· 国际关系史专论 ·

论析帕麦斯顿时期英美平等关系的确立

王黎¹, 王梓元²

(1.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史学系, 天津 300071;
2. 伦敦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系, 伦敦 英国)

摘要: 19世纪中期, 英国面临美国追求平等的挑战。虽然帕麦斯顿首相在维护英帝国利益时, 惯以海外用兵或以武力相威胁, 但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他却常受掣肘以至有所妥协。这不仅为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而且挑战了大国间“难逃权力和平转移厄运”的观点。为此, 探析帕麦斯顿时期的英美关系是必要的。毫无疑问, 加拿大易受美国攻击的考虑、英美之间日趋互补的经贸关系、困扰英国的欧洲时局等均为重要原因。然而, 英美在磨合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认同, 则是促使拥有全球利益的英国最后接受美国以平等地位加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主要考虑。

关键词: 帕麦斯顿; 英帝国; 平等地位; 权力转移

1783年独立的美国渴望融入欧洲外交体系, 但它并未因此获得平等的地位。由于在治国经验与实力上和欧洲国家差距甚远,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在政治上遭到欧洲君主们的敌视, 同时在心理上也被蒙受歧视。这一状况直到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结束时才有所转变。故1814年的《根特条约》被认为是美国建国以来首次与英国签订的最为平等的条约。尽管双方对“平等”的理解不同, 伦敦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前殖民地的民众“确有桀骜不驯的秉性与能量”。^①

此时的英国不仅在欧洲获得了空前的地位与影响,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更大的商业利益与势力范围。^②从1830年至1865年间, 曾几度出任英国外相与首相的帕麦斯顿(Henry J. T. Palmerston)积极推行帝国扩张。在其执掌英国事务期间, 他多次在欧洲、亚洲挑起战事, 其中包括两次侵华战争。这位铁腕人物把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概括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③丘吉尔称其为英国历史上“最为能干的政治家之一”。^④不过, 作风强悍的帕麦斯顿在处理19世纪中期追求大国地位的美国时却很谨慎。到底是哪些国内外因素的考量让这位政治家接受了美国的挑战? 作为资深的英国政治领袖, 帕麦斯顿意识到一旦接受了美国的平等地位, 它将意味给大英帝国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

美国开始追求与英国平等地位正值帕麦斯顿任职期间, 此时也是英国海军与其金融实力迈向巅峰的时期。然而, 任何国家的政策都难免不受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之影响。因此, 他密切关注影响英国外

收稿日期: 2012-11-09

作者简介: 王黎,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研究中心、世界史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欧美外交史; 王梓元,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① Thomas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Crofts, 1969, p. 157.

②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 speaking Peoples*, Vol. iv,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56, p. 51.

③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3.

④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English - Speaking Peoples*, iv, p. 51.

交政策与其核心利益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便在维护国家安全时能够把握“必须”与“可能”的界线。探究帕麦斯顿时期英国缘何接受美国平等地位的这段历史，可以求证欧洲人曾经称之为“店主国家”的英国和美国，除了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共性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如何看待日益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方面也趋于认同。^①

首先，本文追溯并论证帕麦斯顿在推动“以英国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注重从全球战略视角去权衡英帝国的整体利益。这一点对英伦岛国来说十分重要。这既显示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务实特征，也是变化中的国际趋势的要求。准确地讲，19世纪中叶出现的英美平等关系不仅始于帕麦斯顿时期，而且直接影响到后来在两国之间发生微妙的权力转移；其次，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坚持认为：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与志在崛起的国家（*rising power*）通常“难逃霸权转移的厄运”。^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本文指出，这一学派信奉的经典案例是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早期西班牙、法国与英国之间的长期角逐，特别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德国与英国的海洋争霸。可是它们鲜有提及，同时期支配世界体系的英国却最终接纳了美国权力的崛起。

历史的发展绝非静止或只是偶然。19世纪末英国能够接受美国崛起这一历史性的挑战，是帕麦斯顿时期两国关系悄然变化的结果：即美国看到了在以英国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内求平等、谋发展利大于弊；而英国接受了充满活力且开放自由的美国，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影响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故论析19世纪中期英美平等关系的变化与确立过程，是理解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前提。^③严格地说，帕麦斯顿并没有目睹美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但是他在任职期间，两国政府开始谋求通过外交与条约而非诉诸战争来解决它们之间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与国家实力的关系。有鉴于此，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反而由于美国的来加入变得更加稳固。这就是本文探究的兴趣所在。

一、帕麦斯顿眼中的英美关系

帕麦斯顿出生于1784年，当时美国刚刚从英国殖民体系中独立出去。随之，英国对其外交政策的反思使其对外行为变得谨慎。但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再度让英伦岛国全力投入一场长达20年的欧洲战争中去。正如英国1792年12月递交给法国的外交照会中阐明的那样：“英国绝不允许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推翻欧洲国家共同接受的神圣条约体系。”^④1807年年仅23岁的帕麦斯顿带着保守的政治倾向步入英国政坛成为议会议员，并以“维护英帝国的利益为己任”。^⑤他最初在政治上表现强硬是在1808年。当时，英国海军炮轰了奉行中立政策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目的在于摧毁可能会被拿破仑征用的海军舰只。当这一海盗行径遭到国内外质疑时，他援引国际政治中“自我保护”（*self-help*）原则为英国辩护。从此，他支持英国在外交努力失败后，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强制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一强硬态度不仅为帕麦斯顿赢得了国内政治资本，同时成为他日后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⑥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帕麦斯顿赞成英国在和平时期保持强大海军的主张，以确保其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与利益。作为政策，他信奉维系欧洲大陆的均衡是英国外交的基石。^⑦

然而，英国很快面对一个新的棘手问题，那就是第二次英美战争的结果带给英国的潜在挑战。虽然从纯军事角度上难以断定英美谁是赢家，但在政治上，美国无疑是一个日益壮大的国家，特别是其潜力与决心更不容轻视。对此，英国惠灵顿将军（A. W. Wellington）写道，美国幅员广袤难以从外部

① Walter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xvi.

② Joseph S. Nye, Jr., *Power in the Futu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 208.

③ Walter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pp. 81 – 83.

④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English – Speaking Peoples*, iii., p. 286.

⑤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The Wordsworth Reference, 1994, p. 282.

⑥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101.

⑦ Michael Sheehan, *Balance of Power –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38.

对其攻击；而加拿大地理之遥也难以提供必要的保护。^① 1814 年之后的美国社会不时流露出这场与英国的战争带给他们的自信。美国人以“天定命运”为己任在北美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的空前扩张——“西进运动”。当时美国与尚属英国领地的加拿大早已存在边界争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立即成为帕麦斯顿执政时期英美之间的矛盾焦点。

1830 年帕麦斯顿初任英国外交大臣。虽然他在 1826 年支持坎宁关于美国在未来欧洲均势中作用的想法，但他公开抨击美国人的虚张声势以及对土地的贪求，其中包括美国南部盛行的“奴隶制”。然而，出于对加拿大安全的考虑，帕麦斯顿不得不向美国总统杰克逊示好，并于 1836 年充当了美、法两国在海权司法争议中的调停者。^② 这一短暂的和平却被一直存在的美加边界争端所破坏。到了 1841 年，英美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由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攫取了殖民权益，帕麦斯顿试图同样以战争威胁来“教训”美国。但是，他的强硬态度却遭到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夫妇的反对。1841 年取代帕麦斯顿主管外交事务的阿伯丁（Lord Aberdeen）努力推动与美国关系的缓和，并派新任驻美公使艾什伯顿（Lord Ashburton）前往华盛顿谈判，随后两国政府签署了重要的《韦伯斯特—艾什伯顿条约》（Webster - Ashburton Treaty）。^③ 它稳定了美国与加拿大东北部边界，并开始朝着英美平等关系的方向发展。帕麦斯顿不满意条约的内容，但是随着两国间贸易商业往来的扩大，出现了被日后称为以英美为纽带的“大西洋经济体”（Atlantic Economy）。^④ 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在俄勒冈领地划分问题上的相互让步成为英美关系史上的另一转折点。1846 年 1 月 3 日《泰晤士报》写道，尽管两国都存在好战分子和极端情绪，但是，公共舆论的主流是反对战争的。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法律等纽带及其共同追求的目标让我们意识到，使用武力割断这些联系是罪恶的。的确，我们有过反目，但更多的是和解，我们毕竟是同根生。^⑤

不过，这一温情的描述并不能代表英国政治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在接受英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也流露出对美国觊觎加勒比海与中美洲地峡的担忧与反感。从 1846 年至 1850 年，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很难用“对抗”或“合作”来简单界定。在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相互的猜疑与担忧制约了它们政治上的接近。1848 年通过的与新格林纳达（即哥伦比亚）双边条约规定：美国在中美洲地峡区域享有广泛的特权。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雷顿（John Clayton）提出由英美“平等”控制一条地峡通道，以便让全世界所有国家享受其便利。^⑥ 此时，英国对美国在中美洲的战略企图深表不安，帕麦斯顿明示媒体：虽然商业会推进英美的互信，但在公众舆论面前它也常常很脆弱。实际上，他反对克雷顿提出的英美平等的建议，担心这一提法可能单方面导致美国地位的提升，并随时把英国的海外利益拖入困境。帕麦斯顿一贯反感美国人不守常规的作风。他要在加勒比海以及中美洲地峡问题上“不放弃帝国的既得权利与尊严”。^⑦ 这是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广泛的殖民权益。而美国的介入无疑挑战它的既得利益。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国家，英国时刻关注任何新的竞争者。美国此时的航运与造船能力足以让英国担忧。显然，英国深知对中美洲地峡的控制意味着将加强海上的机动性并大大缩短大西洋通向太平洋的距离。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美国而言，它都极具战略价值。对于那些主张与美国妥协的阁员，帕麦斯顿警告他们“这无异于助长美国贪得无厌的领土欲望并误导他们更加有恃无恐”。^⑧

1849 年至 1850 年，英美两国在中美洲地峡问题上确有剑拔弩张之势。英国的强硬态度让美国政

①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English - Speaking Peoples*, iv, pp. 4 - 6.

② Richard Morris,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3, p. 170.

③ Richard Morris,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pp. 185 - 186.

④ Crane Brin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112.

⑤ H. C. All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 History of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1783 - 1952)*, London: Odhams Press, Ltd., 1954, p. 413.

⑥ Thomas Pat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Company, 1988, p. 136.

⑦ H. C. All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23.

⑧ Gavin Henderson, "Southern Designs on Cuba, 1854 - 1857 and Some European Opinion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no. 5 (August 1939), p. 385.

府也有所顾虑。考虑到仍需要时间来消化在不久前美墨战争中吞噬的广袤领土，美国认为“英美两国政府需要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智慧，否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难以避免”。^①不过对拥有全球利益的英帝国而言，帕麦斯顿很难在地峡问题上与美国摊牌，原因是此时震撼欧洲的1848年革命余波未平，又出现了如何维护奥斯曼帝国生存的“东方问题”。更不能忽视的是，加拿大自身脆弱的防御一直困扰着这位帝国利益的维护者。同样重要的是在英国工商界与知识界中，多数人相信英美商贸之间的往来是加深两国共同利益的纽带，特别是来自英国的金融家与土地投资者，他们与美国有着切身利益的关联。鉴于英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以及多数阁员的反对，帕麦斯顿最后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建议：在地峡区内不设立任何排他性的规定。在保障两国利益的同时，未来开凿的运河将对全世界各国的航运公平开放、利益均等。英美政府同意将这一原则写入1850年4月签署的《克雷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它规定“英国与美国均不得在中美洲的运河区内追求垄断或设防；为此，禁止任何一方在该地区寻求支配性的权益”。^②参加谈判的英国特使布尔沃(William Bulwer)认为，该条约缓和了两国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桀骜不驯的美国在中美洲的行为。实际上，帕麦斯顿政府此时渴望通过非武力手段阻止美国在整个新大陆的扩张；这一态度最终导致了1854年6月两国政府签署了英美关系史上另一重要协议——《加拿大互惠条约》(Canadian Reciprocity Treaty)。^③虽然该条约只是涉及美加双方捕鱼与航运权益，但是它与上述的《韦伯斯特—艾什伯顿条约》、《克雷顿—布尔沃条约》以及俄勒冈边划分协议一起在稳定了英美关系的同时，也构成了后来双方视为平等的法律基础。^④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并没有形成遏制美国的具体政策；相反，英国社会对美国的扩张行径或轻描淡写、或是出于商业利益而主张与其友好。1857年12月帕麦斯顿就英美关系做了这样的分析：“美国拥有地利、人众、做事果断的优势；他们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没有底线；而英国则远离事发地区、并常常因优柔寡断而败事；因此，通过互惠的商业往来维系并推动与美国的和平关系，实为上策。”^⑤1859年帕麦斯顿政府在中美洲地区向美国示好，其中包括英国主动放弃一直让美国反感它在该地区拥有的保护国地位。为此，历史学家伯尼(Kennedy Bourne)认为，此举表明英国实际上不再遏制美国在新大陆的扩张及其与日增的影响。^⑥而美国则通过一系列条约或协议有效促使英国接受它渴望得到的平等地位与国家尊严。早期美国政治领袖——杰斐逊、亚当斯、门罗等人关于对英国的看法似乎已成共识，那就是与欧洲大陆君主国家相比，尽管英国傲慢并工于心计，但它是一个较为可靠的开放型伙伴，故与其达成默契绝非不幸的选择。^⑦

1860年爆发的美国内战诱惑帕麦斯顿及英国政界的保守势力试图对美国采取敌视与投机的政策，从而使两国趋于和好的关系再度陷入了长达10年的对抗。

二、美国内战与帕默斯顿的最后选择

学者们通常惯以英国王室1861年2月5日发表的声明来佐证其对美国内战的态度：即“英国无法忽视北美合众国内部发生的分裂及其后果，因为两国人民的共同祖先以及超出一般外交意义上的密切关系将会受到严重影响”。^⑧然而，再度任英国首相的帕麦斯顿却另有打算。虽然他声称在最后任期(1859-1865)内避免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再度开战，但是，帕麦斯顿必须密切关注美国政局的动态。这是因为南北战争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对英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关系到如何与志在崛起的

① Thomas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274.

② Mary Williams, *Anglo-American Isthmian Diplomacy 1815-191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16, p. 92.

③ Richard Morris,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p. 217.

④ Charle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p. 76.

⑤ H. C. All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423.

⑥ Kenneth Bourne, "The Clayton-Bulwer Treaty and the Decline of British Opposition to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7-186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III (September 1961), p. 289.

⑦ Walter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p. 200.

⑧ Beckles Wilson, *American Ambassadors to England 1785-1928*, London: 1928, p. 308.

美国避免敌对关系。^①他曾多次表示“已经足够庞大的美国应该解体，这不仅会在地缘上削弱来自美国的竞争，以提升英国在美洲大陆的影响；同时也会由于出现一个南部邦联”，而为“英国的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与廉价的原料”。^②毫无疑问，加拿大的安全也会由此得到保障。1861年4月美国内战爆发伊始，英国宣布“中立”并称南北双方为交战方。可见，伦敦的政客们、特别是老谋深算的帕麦斯顿企图利用国际法概念来掩饰他们对南方分裂势力的非正式承认。^③当北方政府决定对南方“叛乱”各州实施海上封锁时，帕麦斯顿立即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莱恩斯（Lord Lyons）通知白宫，如果严重依赖外部进口棉花的英国纺织行业蒙受损失的话，“为此承担巨大压力的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使用任何手段来保障其商业运行”。^④

战争初期，帕麦斯顿担心如果英国政府在承认南方邦联问题上过于草率，可能会招致美国对加拿大的报复，甚至不惜与南方做出某种程度的政治妥协。当时美国国务卿西瓦德（William Seward）警告欧洲，任何承认南方分裂势力的国家都会被视作美国的公敌。^⑤不仅如此，帕麦斯顿相信如果公开站在奉行“奴隶制度”的南方邦联一边，英国民众将不会支持；况且，他本人也厌恶美国南部存在的“黑奴制”。

然而，1861-1862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几乎把英美两国推向战争的边缘。首先，11月8日发生的“特伦特号”事件是两国政府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当时这艘开往欧洲去的英国汽轮被美国海军截获，并带走船上的南方特使梅森（James Mason）和司莱代尔（John Slidell）。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伦敦，在好战派舆论的怂恿下，英国的战争威胁不断升级。然而，美国也提出进犯加拿大以要挟英国。在战争一触即发时，帕麦斯顿向英国女王表示“他已准备给予美国一记彻底难忘的教训”。^⑥此时在华盛顿的莱恩斯转告西瓦德“英国政府提出三个要求必须予以满足。即美国正式道歉；释放梅森和司莱代尔；并准许他们继续前往欧洲”。^⑦虽然林肯政府最初拒绝放人，但鉴于北方军队在战场上的困境，再与英国开战无异于自杀之举。12月6日，识时务的华盛顿政府正式答复并满足了伦敦的要求。这样，英美之间第一次外交危机便化险为夷了。

然而，英国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与利益集团继续向帕麦斯顿施压，敦促他利用美国内讧的机会为帝国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1862年3月和7月，由英国建造的两所新型战舰“佛罗里达号”和“阿拉巴马号”分别“逃逸”到南方军手中。从而引发了英美间的第二次危机。特别是“阿拉巴马号”在以后两年中相继击沉、击伤近60艘北方的船只，并给美国政府友好国家的海运业造成巨大威胁。就连英国政府中的温和派系也被迫承认，这艘由英国海员驾驶而悬挂南方政府旗帜的军舰，用英国的火炮及装备击沉、破坏了友好国家的许多船只，实为英国政府之过错。此时的帕麦斯顿虽然为英国企业利益集团的行为坚决辩护，但是他深知英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特别是此时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埃尔德塔亲王对美国的態度是“只要和平”。^⑧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的疑惑与争论一直围绕着为什么英法两国没有进行计划中的外交斡旋与干涉；如果发生，战争初期深陷困境的美国是否会对英法两国宣战，那后果又将怎样？

南方邦联的独立与合法地位是否会被欧洲列强所承认？为此，存在的两种解答：第一，南方军始终没有为其政府获得一场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为此，帕麦斯顿认为最好等到战场上形势明朗之后，英国再做出最后决定；第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宣读之后，在英国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在美国驻伦敦领馆任职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写道，似乎一夜之间这里的人们变得同情北方的正义事业。英

① H. C. All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452.

② Stuart Anderson, "1861: Blockade vs. Closing of the Confederate Ports," *Military Affairs*, 41 (1977), pp. 190-193.

③ Wilhelm Grewe, *The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Law*, Berlin: W de G, 2000, p. 539.

④ Charle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p. 96.

⑤ Thomas Pat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 p. 138.

⑥ Charle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p. 101.

⑦ Ibid., p. 100.

⑧ Samuel Morison and Henry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ol. 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711.

国自由主义政治家考普顿 (Richard Cobden) 也写道 “显然赞成干涉美国内战的情绪一直存在。但是，总统的黑奴解放宣言激起了英国民众前所未有的反对奴隶制的情绪。我现在可以预言，由于这是一场明确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所以任何英国政府对美国采取的不友好行为都不会得到英国民众的赞同。”^①言下之意，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敢对为消除奴隶制度而战的美国公然采取战争行为。

就帕麦斯顿而言，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以及对美国整个政策的分析始终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最初的战局状况。虽然 1861 年南方军在东部战绩辉煌，但在得克萨斯和西部却成就甚微。此外，北方海军对南方邦联港口的封锁更让其对外贸易锐减。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没能在关键的东部战场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让帕麦斯顿认定，战场上的僵局会耗尽北方人民的承受限度，最终迫使南北双方以停战的方式来维系现状。这样的结果就是英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设想完成分裂美国的目的。其二，“棉花至上”理论的局限性。尽管南方以棉花为武器，并深信英国和欧洲国家为了本国的企业开工要卷入这场南北战争。然而，他们忽视了英国纺织业主不仅早有大量棉花贮备，而且埃及和印度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市场。同样，英国民众对北方小麦的需求也大于对南方棉花的依赖。这样，以棉花为武器的奇想在南北战争中成效甚微。其三，英国决策层中的顾虑。尽管帕麦斯顿及同僚希望南方邦联早日获得国际承认，但不稳定的欧洲局势迫使他们行动谨慎。1863 年夏季，法国对墨西哥出兵之举震惊英国朝野，同样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表现得优柔寡断，让英国不得不谨慎与其合作。此时，俄国希望借助统一强大的美国来制衡英国霸权的计划也困扰着英国决策者。^②这一切都让英国社会上下认为，再与美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是绝对不符合英国长远利益的。

当美国内战进入第三年时，英国政府的观望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代之而起的是“不轻易激怒美国政府”的共识。此时已 80 高龄的帕麦斯顿在给罗塞尔的信中说道，美国南北双方的冲突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角逐，对此，英国应该在静观这场战争结果的同时，避免由于草率而引起的麻烦。虽然他在晚年仍不喜欢美国，但是与当时其他欧洲君主不同的是，帕麦斯顿懂得，无论你是否喜欢美国，你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与未来的潜能。^③到了 1863 年末，南方邦联企图获得欧洲国家的承认与援助已成为泡影。而北方外交则表现得更加灵活而富有成果，他们拥有着南方正在失去的东西——那就是足以支持外交的工业实力与军事能力。英国仍是战时外交的焦点，因为它是欧洲政治中的支配大国并直接控制着加拿大，同时皇家海军也是唯一能够封锁或保障大西洋航线的力量。然而，这些强势渐渐受制于美国的地理优势。远离帝国政治中心的加拿大时刻暴露在美国的威胁之下，欧洲国家中也不乏支持美国的朋友，就连帝国海军也受到私掠船队的攻击。虽然此时的英国仍然比美国强大，但它已经不再可以发号施令。^④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曾经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国家”的英国与美国，不仅关心自己眼下的安全与利益，而且同样思考世界秩序的构建。两国的治国精英们认为，世界范围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会使国家富裕起来，这些财富能够赋予它施展军事力量的能力。这样，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金融、商贸关系在 19 世纪初已经渐趋紧密。作为原材料和食品的来源地，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安全阀，作为海外投资的理想场所，美国对大英帝国的整个安全利益不仅变得日趋重要，而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就是帕麦斯顿在处理美国问题时必须考虑的现实。

结 语

探究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应该关注政府层面，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两国之间如何看待或认知对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点尤为重要。基辛格在他《大外交》一书中称，自 1830 年以降的 30 年间，帕麦斯顿是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与执行者。尽管最初他资历尚浅，但当时奥地利首相梅

^① Charle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 - 1900*, pp. 98, 105.

^② Thomas Pat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 pp. 144 - 145.

^③ Norman Graebner, "Norther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Realism" i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I: to 1914, edited by Thomas Paterson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9), pp. 323 - 324.

^④ Thomas Pat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 p. 146.

特涅却欣赏这位晚辈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他曾说过“帕麦斯顿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在游刃有余地干涉埃及的同时，也能够让法国感受到英国实力的存在；他暗示奥地利与普鲁士，在关键时分他更需要俄国而非它们；同时，他又通过接近法国让沙皇在心理上常有失落感。总之，帕麦斯顿能够让其他欧洲列强相互猜测而又不暴露自己的底牌。”^①历史学家泰勒把帕麦斯顿的治国方略概括为：他从一个政治上保守的普通官员转变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他对外彰显英帝国的实力，并信奉维护均衡的外交原则。此外，他巧妙地利用媒体舆论在英国的政治中发挥作用。^②

可是，上述评价忽视了一点，作为英国的政治家，帕麦斯顿一贯强调英帝国已是成熟的世界大国。所谓成熟大国应该是根据国际政治中环境的变化，审时度势地为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修改或自愿限定所追求的目标。为此，英国在关注欧洲国家间相互制衡的同时，能够在战略上灵活处理与美国的长远关系。^③这样，支配整个19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虽然始于坎宁，但是最终促使这一政策成熟的则归功于帕麦斯顿的努力与贡献。^④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务实谨慎，并在1845年就发出警告，历史上的英国天然护城河——英吉利海峡将变得意义甚微，从而危及帝国本身的安全与海外贸易。^⑤因此，帕麦斯顿似乎回到了1823年坎宁坚持的立场，那就是，在继续维护英国既得利益的同时，应该学会如何接受美国在西半球挑战英国并要求与其地位平等。本文的中心论题也即在此。

责任编辑：宋 鸥

Palmerston and Anglo –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ang Li¹, WANG Zi – yuan²

- (1.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Britain)

Abstract: Since the mid – 19th centur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Palmerston witnes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ursued the great power status that would lead to its restlessness accordingly. Though a tough defender of the established interest of the British Empire, he acted cautiously in view of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nsequence, United Kingdom had to eventually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t od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heory of “non –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Palmerston had to do this. The final arguments follow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such as the vulnerability of Canada, the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Anglo – Saxon nations and the menace from European conflicts. Above all these is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dominant British Empire would have to accept the equal partn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Palmerston; British Empire; equal partnership; transition of power

① Harold Kissinger, *Diplomacy*, p. 101. 当时激进的英国议员 Thomas Attwood 称帕默斯顿是外交上的伪君子。

② A. J. P. Taylor, “Lord Palmerston,” *History Today*, (Jan., 1991) vol. 41, no. 1, p. 1.

③ Robert 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 – 191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 p. 53.

④ Hans Morgenthau, 6th ed.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for Peace*, New York: McGraw –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 488.

⑤ [英] 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